

明清之际
小说评点学之研究

林 岗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林岗著.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7
ISBN 7-301-04373-2

. 明... . 林... .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4233 号

书 名: 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

著作责任者: 林 岗 著

责任编辑: 马辛民

标准书号: ISBN 7-301-04373-2/ I·0551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址: <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室 62752025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版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 新华书店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166 千字

1999 年 1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2.80 元

序

林岗曾在我们博士点攻读博士学位。在这之前他已是国内知名的青年学者,著有《符号、心理、文学》、《传统与中国人》(与刘再复合作),还发表了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但我未认识他。博士生笔试通过后,他来面试,我想,他是年青又有为的人,会有学问上的刻意表现,没想到他表现得很平实,除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外,并没有任何的张扬,询及他前期的成果时,他的回应也是淡淡的,仿佛他只做了和别人一样的工作。所以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素朴和不自满,当然,从他对一些理论问题的答案中,我也感觉到他有深刻的思想。后来,在我主持和组织的许多大小学术研讨会上,又不断加深了我这一感觉。他平时言语不多,每一发言,必有不入俗套的见解,这一点使他在此间博士生群体享有很好的学术信誉。

林岗对学术问题、对中国社会有一种深沉的关怀,对自己选定的课题肯下功夫,认真地去读书、思考、辨析、研究,力求做得有新意。《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就是他近几年研究的一个突出的成果。在书中,他对我国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作了系统的梳理,并运用现代美学的观念,将其上升到文化诗学高度作深入的、有独到见解的阐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为古代小说评点研究提供了值得注意的新视角。近十年来国内有不少学者对古代小说评点文体作过研究,同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比较,林岗这本专著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晚明文人文文化”基础上阐释小说评点文体的价值,发现这是一个有内在思维理路、大体完整的评点学批评体系,并将其分为结构论、文理章法论、修辞论三个核心层次,统一在“文本意识”之下,分别对这三个层次的内涵意义作了精当的论述,使明清小说评点学显示出某种新的意义,从而对80年代的同类研究构成了一种突破,有助于认识这种诗学文体“背后”的社会文化缘由。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林岗在著作中除采取实证的方法外,还运用了中西比较研究方法,他把明清小说评点所体现的美学观念同西方叙事文学的美学观念作比较分析,并由此而追溯到中西哲学宇宙观的差异。在展开阐述自己的思路时,做到既努力探求古人的“文心”,又注意挖掘古人论点的现代意义,体现了20世纪末学术研究的特色。

《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虽是林岗这几年写成的,但他对这个论题的关注并非是近期的事,而是他多年思考的结果。他在90年代初曾先后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研究一年,在美国访问研究期间,他所做的也是与这一论题相关的研究,已发表过相关的论文多篇,其中有的收入他新近出版的《边缘解读》一书中。林岗作为一个80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面对急骤变化的社会现实和各种各样学术思潮,他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见解和态度,显然是一个有思想和多思、善思的人,为此,我特别喜欢他。我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有更多的人了解他,了解他内在的学术活力和有创意的学术见解。

饶 子

1999年1月8日于暨南园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序论	(1)
继 16 世纪文人小说繁盛而出现十七世纪小说评点的热潮;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的概念;评点学批评体系的三层次命题:结构论、文理章法论和修辞论;索解之道:批评文本与小说文本的特殊关系	
第二章 晚明背景下的文人文化	(15)
小说评点学是晚明文人文化的产物;晚明经济活跃与所谓“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思考;朝纲废弛与士人仕宦生涯的挫折感;士林讲学风尚所启发的个性气质与狂狷精神;晚明文人文化的独特性;事功失败转向文化创造;改编修订先前小说文本、弄笔评点、探求美术真谛、写作传奇、从事演艺、游历探险、埋头医学史学著述、潜心西来科技实证之学等构成的文人文化的风景	
第三章 评点学的渊源	(52)
唐宋以来诗文评精细化的倾向;古文经义教育与评点的出现;早期评点示例;明代科举养成的“时文手眼”;八股文训练对评点家思想方法和眼光的影响;与科举训练有关的评点传统给小说评点提供了一个形式的框架	
第四章 小说话语与评点学的文学自觉	(68)
史学话语笼罩下的小说话语;古人小说话语至晚明发生一大转换;晚明小说话语对传统小说话语的突破;李贽扫除文体偏见的思维理路的根源;金圣叹的事文分立观与他对文学普遍特性的阐述;汉魏六朝文论对文本特征的关注;评点学论文的大思路继承了汉魏六朝批评的正路;以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为标志的文论史上的第二次“文学自觉”	
第五章 叙事文结构的美学观念	(112)
中西叙事观念对结构理解的分歧;古典长篇“缀段”讥评的偏见;奇书小说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开锁的大结构原理;结构模式的美学特征;自然论哲学传统对叙事文结构美学观念的影响;因果论传统与自然论传统所导致的叙事差异	
第六章 叙事文理的章法	(141)
故事单元的概念与叙事的特殊含义;意象、细节、人物和情节段落的反复迭现的运用;前铺“引文”后叙“余韵”的手法;对偶原理在叙事文中的活用;“正笔”与“闲笔”的交替穿插;古代叙事的观念:以“段”的空间化组织安排作为文理脉络的基本贯穿;叙事空间化的思想背景	
第七章 语文修辞的文笔意趣	(176)
中西小说叙事中修辞观的差异;评点家对奇书修辞的精辟眼光;谐音、双关、隐喻在细节中的特殊作用;反讽修辞与“曲笔”;白描传神的实质含义;古典小说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再思考	
结语 深具文化意蕴的批评形式	(204)
论文批评的形式与批点批评的形式;五四以来对批点批评形式的偏见;传统的评点之学是深含中国文化意蕴的文学批评形式	
附录:建立小说的形式批评框架 ——西方叙事理论研究述评	(207)
后 记	(226)

第一章 序 论

明朝自弘治(1488—1505)以后,由文人改编、修订、增删、整理、出版先前民间流传的平话、演义等所谓“稗官小说”的活动渐趋活跃,特别是嘉靖(1522—1566)、万历(1573—1619)两朝,这种文学活动达到了历史上最繁荣的程度。文人对民间的原始素材、先行故事的加工修订,不同于今天由作者个人单独进行的文学创作。它一方面是修订者、整理者的个人努力,正是这些文学素养良好的文人参与修订、整理,才将故事提高到具有完整而自觉的艺术构思的水平;另一方面先前民间流传的底本也提供了充分的基础。这种在流传底本基础上修订、整理的文学活动是那个年代文学创作的重要方式。我们今天读到的明代最脍炙人口的几部作品,都是在这一阶段最终定形并以“最完整的形式流传于世”。《水浒传》的版本繁杂,根据明人的笔记资料,嘉靖年间已有包括一百零八条好汉全套故事的百回本流传。但嘉靖本现今只有残本传世,不能窥见全豹。现存的全本繁本《水浒传》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和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无涯刻印的一百二十回本《李卓吾评忠义水浒全传》。《三国演义》的版本流传情况更加复杂,目前所见最早的是“嘉靖本”,但现今留下蒋大器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的一篇序文,写于弘治七年(1494)。“嘉靖本”之后,各种翻刻本不断问世,可谓争奇斗艳,层出不穷。《西游记》最早的刻本是万历二十年(1592)陈元之序的世德堂本,后天启、崇祯间又有叶昼托名李卓吾批评的足本《西游记》。《金瓶梅》最早刻本出现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为东吴弄珠客作序的《金瓶梅词话》,后有崇祯绣像本。除了以上四种被清初及后来人称作明代“四大奇书”之外,还有冯梦龙改编、整理民间流传故事和仿话本体例创作的“三言”,以及凌蒙初创作的“二拍”。这两种书均出版于天启、崇祯年间。以上所提到的只不过是明代中晚期最有代表性的小说,如果我们不是狭义地理解文学创作,此足以证明有明一代的中晚期是历史上“稗官小说”纷陈杂呈的繁荣时期。

“四大奇书”之中,除《西游记》、《金瓶梅》可定为嘉靖、万历年间作品而无甚争议外,至于《三国演义》、《水浒传》出现的年代,哪怕一个比较模糊的年代界定,在学术圈内都远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一般把它们定为明初作品,更有的定为元末作品。浦安迪主要根据现今这两部作品的版本流传情况,根据作品本身的体例和它们的长篇虚构叙事文的文学特征,而不是根据前人只言片语的记载或作者一鳞半爪的生平资料,将嘉靖、万历年间定为它们以“最成熟的面貌问世”的时间。也就是说,明代的中晚期代表了两部作品版本演化史上最重要的时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作品样貌就是那时文人修订、整理的结果。在确定“四大奇书”版本演化年代的基础上,浦安迪提出“16世纪文人小说”(literati novel)这一富有启发性的概念。他的核心看法可以综合如下: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小说文类,是一种书香文化界的产品而不是一种只流行于下层社会的民间作品;这个看法并不否认文人小说脱胎于通俗的民间故事、平话和说书,而在于强调明文人熔铸、改造民间传统,从中创造出崭新的散文小说文体。因此,这些文学体裁反映了文人的思想抱负、美学趣味,其字里行间的遣词造句,字缝里的深远寓意,也要从文人惯用的技巧修辞手法获得解释。浦安迪将“四大奇书”看成是严肃小说而不是通俗小说,这对本文将要讨论明清之际的评点学是富有启发意义的。事实上,浦安迪也坦率承认他关于文人小说的看法得益于那个时代的小说评点家。评点家早已指明读者不可以将这些天地之间的“妙文”视作弹词、平话一类的东西。

是否将“四大奇书”和类似的作品称作“文人小说”可留待讨论。但这些小说有相当浓厚的文人色彩和文人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本文在浦安迪论点的基础上,将问题扩展到探讨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学。稗官小说的不时冒出和评点家对它们的持久兴趣在这里牵涉到两个相互关联的问

题。第一,知名和不知名的好事者修订、改编、整理那些先前不见经传的稗史小说和后来评点家对这些新出现版本的热心评点,都属于明中晚期和明清之际文人文化的现象。我们只有在这个视角下观察作品及其评点,才可能作出符合事实的解释。如果我们不是循文人文化现象而是从通俗文化的视角看待它们,就会有許多地方解释不通。例如对小说表现出来的文人价值观和美学趣味的把握,评点家对小说本文释义作出的种种褒扬和贬斥,就不可能有通透的认知。第二,随着完善版本的出现和流传,评点家继起对之评点,表现了他们对文人价值观和美学趣味的认同。笔者有理由相信,评点家所以评点作品,与我们今天以文学批评为职业的学院式风格有很不相同的思想文化背景。他们不是站在职业的立场批评作品,而是站在文人的立场批评作品。评点家对文本的读解与文本本身价值观、美学趣味是一致的。这种对文本在深入认同基础上的批评,使得我们在远离古人的今天如果冀图重构评点家的批评体系,就必须紧密结合评点家当日所依赖的文本。本文的任务虽然只是探讨批评文本,但笔者深知其成功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却取决于对作品文本的读解。因为两者所流露的世界观和趣味实在有太多的一致性。它们都是文人的产物。

小说评点大兴于明清两代,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本文标出“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意在把这个时期的评点学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而加以研究。继好事者修订、改编、撰写稗官小说,对这些文本的诸家评点也稍晚面世。现存最早而完整的小説评点当数容与堂本《水浒传》,后又有袁无涯刻本。由于两本都题李卓吾批评,孰真孰伪,至今仍未有一致的意见。不过,究竟何本是李贽所批,抑或二本均非李贽评点,对我们探讨该时期的评点学并无重大影响。两本相较,一般认为容本评点比袁本更高明。崇祯十四年(1641),金圣叹终于完成积十数年心血批点而成的贯华堂本《水浒传》,以《贯华堂第五才子书》的名目刻印刊行。金本问世,光芒覆盖他本。有清三百年,金本成为唯一的通行本,人只知有贯华堂本而不知有他本。入清后顺治十五年(1658),金圣叹又刊行他晚年呕心沥血之作《贯华堂第六才子书》,即金本《西厢记》。金圣叹的这两种评点都可以说是明清评点的扛鼎之作。《三国演义》的评点本,现存有余象斗、叶昼伪托李卓吾、钟惺、毛纶和毛宗岗父子、李渔五家。诸本之中,李渔评本最晚出。而李渔没于康熙十八年(1679),批点当完成于此。毛氏父子批点《三国演义》约完成于康熙五年(1666)。毛氏父子评本的影响也如金本一样,此评一出,诸本尽废。张竹坡评《金瓶梅》本即《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刻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由于张所据的是崇祯绣像本,张评本一出,人几不知有词话本。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重新检得词话本,世人方知还有更早的刻本。除上述评点本之外,还有陈继儒批点《列国志传》、徐渭批点《隋唐演义》、钟惺批点《东西两汉全传》《封神演义》《夷坚志》、汤显祖批点《艳异编》《虞初志》、叶昼托名李卓吾批点《西游记》、冯梦龙批点《情史》《石点头》、剑啸阁批点《隋史遗文》等。明清之际,文人谈论他们对稗官小说见解的,除了评点还有一批序跋、笔记、散论等。以上提到的诸种评点文字,当然仅仅是勾画了明清之际评点圈子的大致轮廓。但从这个粗略的轮廓也足以看出,文人批点那些圣人不齿的稗官小说,确在那时蔚成风气。谓之批点热,恐怕不为过分。

从上述简单罗列的资料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看法。第一,前所未有的对批点小说的热衷,是继诸种作品问世之后开始的。说明文人的兴趣在相当程度上是受作品的感染。作品道出了他们心中的喜怒哀乐,传达出他们的人生感叹,故有此批点,能够形成一时的风气。第二,评点小说的风气跨越晚明延至清初。这当然是晚明风气的延续,或者说清初的评点只是晚明的余绪。清初社会风气正在改变,士人如顾亭林、王船山等提倡经世致用,力纠明代的疏狂无学。加上清前中期康熙、雍正、乾隆均是有为勤政的君主,再配以防范、钳制的文化政策,文化思想方面的活泼生气逐渐沉寂;人主风之于上,士大夫倡之于下,清代社会和士林中的这种新风气本不合适评点学的生长。而清初仍然有水准相当不错的评点出现,这当然要追溯到晚明的风流余韵。评点大家之中,

金圣叹和毛氏父子是由明入清的人,晚明的烙印自不待言。金圣叹纯粹是一个晚明文人,其思想、习惯、性格无一不显示出晚明特性。毛氏父子拘紧不少,思想性格与金圣叹亦有不同之处,但他们崇拜圣叹,并以金圣叹为师法榜样。只有张竹坡生于康熙九年(1670),与晚明无甚直接瓜葛,但其时去明未远影响仍在。至于晚明的风气对他造成的具体影响,我们今天虽然不能确知其详,但从他对《金瓶梅》文本读解之中,可以推测大略。由于批评的滞后,晚明评点热伸延至清初,这就是本文为什么称“明清之际评点学”的原因。但事实上评点的风气是晚明造成的,它的出现要从晚明社会背景中寻找因由,才能解释。而晚明的风流余韵一收结,评点即归于沉寂,亦无有水准的评点问世。这可证明明清之际评点学与晚明社会背景的关系。正是由于它与晚明社会风气的特殊关系,本文将明清之际的评点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提出来,并把它同清初以后的评点区别开来。在本论以后各章,笔者会逐渐展开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这一概念,以求得对它清楚的认识。第三,诸种评点本流传至今,孰优孰劣,学者们已经得出基本一致的看法。金本《水浒传》和《西厢记》、毛氏父子本《三国演义》、张本《金瓶梅》与容与堂本《水浒传》是其中的翘楚。¹ 笔者承袭这种认识,在探讨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的时候,主要根据这几种评点本子而间及他本。对最优秀的这几种批评文本的读解,足可以建立本文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的核心观念。

最主要的文人小说即“四大奇书”出现并流传于十六世纪,而最有水准和份量的小说评点则产生于十七世纪。站在中国文论史的立场,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它在文学的观念理论方面的突破,不体现在传统的正宗文体——诗文,而体现在其时尚属“文体卑下”的新兴文体——小说、传奇。有明一代在传统诗文理论的探幽发微方面,上不及宋元,下不逮有清,是一个比较呆板乏味的时期。无论明中期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还是稍后的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他们都没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诗文理论的原创力,只晓得一味标榜高古,效古法古。“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文学主张,只表示他们诗文识见的鄙下。同期标举“唐宋八大家”的王慎中、唐顺之等“唐宋派”,谈文也没有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见解。明后期“竟陵派”钟惺、谭元春诸人,论诗求变更是走入鲁莽灭裂、刻剥古人的死胡同。论诗作文,只有明初宋濂、明中归有光稍有可取,晚明公安三袁“独标性灵,不拘格套”略有新鲜气象。与诗文理论的沉闷了无新意相反,嘉靖、万历以来不为流俗所拘有识有见的文人却在新兴的稗官小说、传奇等文体方面,开了一个前古未见的言说新天地。他们对业已成熟的叙事文体的独具只眼的精辟见解,他们对小说性质、功用、文体特征阐发和洞识,甚至对当时还为相当多士大夫不屑一顾的稗官小说的兴趣,无疑是代表了明代文论最有生气的一面,代表了明代文论最有创见的成就。当然,这里所谓文论的意思,不是在传统意义说的,而是现今文学理论的意思。

将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学放在中国文论发展史的宏观历程来考察,如果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文理论阐发可以称作第一次“文学的自觉”的话,那么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就是中国文论史上第二次“文学的自觉”。魏晋南北朝时期曹丕、钟嵘、刘勰诸人论文谈艺辨别文体,厘定标准品评诗文,形成文论史上第一个对文学和文学性认识的高峰。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当于现今文学意义的各种体裁还未完备。传奇戏曲还未产生,虽然已有小说一词,但它并非具有一定故事长度的叙事文学的意思。² 而自小说、戏曲等新兴文体成熟以来,文人照旧品诗论文对此没有作出足够的批评反应,直到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大盛,这种批评的空缺才填补过来。评点家对“文学的自觉”不是体现在正宗文体方面,而是体现在颇受正统文人歧视的新兴文体。正是存在这一文体批评的补充,古典文论史上对诸种文体的批评才显得完璧无缺。评点家在16世纪文人小说批评的基础上建立起大致完整的小说批评体系:他们一方面阐发小说文体的文本意识,将小说与史传体文章区别开来,确立小说在文体学上的独立地位,这点颇相似于魏晋南北朝的“文笔之辨”。³ 另一方面,他们阐释了小说作为

虚构叙事文的文本特性和小说家的各种叙事技巧。这方面评点家的探讨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追寻虚构叙事文大结构的美学观念,这是在宏观层次把握小说文本的艺术特性;发掘叙事文理的复杂章法,这种探讨颇相似于诗文理论中对“法”的阐释讲求,属于对小说文本细部“肌理组织”的探幽发微;探求小说的语文修辞的笔墨意趣,修辞层次在小说艺术中虽属至微的方面,但评点家却以为这是极重要的一环,他们的探讨创见甚多。笔者认为,这三个层次即结构论、文理章法论、修辞论的阐发构成了评点家关于“文”即小说的文本特性的理论体系。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学作为一种古典的批评体系,体现了以文本为中心的多侧面批评的风格,它既有对“文”的深入探求,又有对“事”的纵横议论。评点中因文而起随事而生的纵横议论也是小说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贯串着“知人论世”的批评传统。小说评点对“事”与“文”的相对侧重看似相互分离,而实质在古人“文心”的概念下是统一的。广义地说,小说评点学也是一种叙事理论,它一方面与现代叙事学的基本思想存在相通之处,另一方面也有不同之点。它表现出强烈的叙事空间化的倾向。其别具一格的批评形式也是深具中国文化意蕴的。

“文心”是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的重要概念,它有二重基本含义:为文者之心(意图动机);文本之心(即核心之心,指文本的文学特性)。而为文者之心又不仅仅与纯粹内心相关,在古人的思想里它是天地宇宙在人心中的见证。所以,“文心”又同天地之心、人文之心紧密相连。评点家自认的批评使命就是通过读解、评点小说重新体认、探究、阐发既至广至大又至隐至微的“文心”。文心浩茫,文心隐微,何处可见?一则想见之于历代读者之心,而历代读者之心随生随灭,现已不复可寻;二则见之于评点家的批评文本,批评文本俱在而文心可觅。本论所作的研究就是对评点家阐发出来的“文心”作现代的读解。所谓现代的读解有三方面的含义:尽量客观地重构评点学即古人的批评体系;进而推究古人的应用的美学思想和原则;并在此基础上阐释评点学可能具有的现代意义。笔者虽然无可避免地使用今人的逻辑方法,但也期望此一逻辑框架能够清晰地勾画出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的轮廓,这项作于评点学产生三百余年之后今人的“复原”工夫,不免带有研究者本人的思维痕迹。但笔者也本着求真问学的初衷,小心读解,尽量避免穿凿附会,以求切近古人的本心。在读解古人的批评文本的时候,存在若干方法上的问题,需作解释。

古人的批评文本和它的文学文本存在异乎寻常的紧密关系。今人的批评由于采取西式的逻辑论述的框架,这种方式重在本身的逻辑自恰,批评文本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但小说评点却连这种相对的独立性都没有。因为古人采取的批评形式使它就象是寄生在小说文本里面一样。寄生一词并不仅指形式上评点附着于小说文本,它离不得小说文本,而且更重要的是批评文本的释义往往需要结合、参照小说文本才能语义完整,并获得理解。稍为离开小说文本而只从批评文本的字里行间去推究评点家的释义,很可能不得其解,或者随意附会。而对小说文本的理解,随着时代的远去,今人和古人可能相差很远。笔者在阅读古人评点时深感索解不易。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两种文本的特殊关系。今人对此点要有深入的体会才能避免无理忽略古人评点和随意附会古人评点的毛病,进而寻求索解之道。

评点本来是为阅读理解而创造的批评形式,当它成为历史陈迹的今天却遇到对它自身理解的困难。笔者认为今次能够带领我们穿越批评文本迷宫的引导,却是小说文本。而它当初也是一座迷宫,读者需要评点的引导才能穿越它。这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理解小说文本,需要借助评点;理解评点,反过来又需借助小说文本。借用版本考证的术语,这就是版本之间的“比勘”,各自都可以作为理解对方的工具。评点的释义固然有助于理解小说文本,但小说文本也有提示、补充、印证批评文本的作用。因为评点里的夹批不用说,就算回前和回后的总评,也是意(评点)随文(小说文本)生的。这“意”通常是不够完整的,需要参照小说文本才能补足古人的文意;或者由于年代久

远,古人文意若明若暗,需要小说文本加以印证。因此,笔者在演绎古人评点的时候,会相当借重小说文本,以小说文本作为理解批评文本的重要参照。

古人评点和我们今人作文学评论一样,总是根据某些观念或美学原则进行的。这些观念或美学原则可能有充分的说明,但也可能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隐于批评文字的字里行间。尤其是那些已成圈内“共识”的观念和美学原则通常是不加说明的,而这些古人不加说明而又自认不言而喻的前提,正是构成了他们批评的基石。因此,一个批评文本的完整读解起码应当包含总结归纳批评文本的架构和推究其隐含的批评前提这样两个方面。其中,第一方面是比较经验性的归纳工夫,第二方面是分析发挥。但分析发挥必须建立在合理的归纳的基础之上。归纳是否合理,对古人批评架构理解是否得当,是分析和阐述能否得当的前提条件。在对古人的批评架构理解错误百出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合理推究其隐含美学原则的。古人不同今人,但今人很可能视古人如己,以想当然的态度看待古人。这就造成了读解时候的附会和凿空。相对来说,以己意附会古人,放言高论,是比较容易犯的毛病。原因是不肯下气力去弄清事物的原委,疏理其中的前后头绪。很难想象在不还事物本来面目的情况下,可以对它评头论足。我们必须看清事物的面貌,才可以推究它的肌理神气。对评点学也是这样,我们必须回到评点学中去,还它的本来面目,在这个基础上再发掘、推究古人未曾明言的观念前提和美学原则。如果说恰当理解古人批评架构是“取形”工夫,而推究隐含观念是“传神”工夫的话,“取形”与“传神”要有一个恰当的配合方能达出评点学的神貌。单有逼真的形则物象枯,而单求其神则画人变鬼。笔者在读解评点学的时候,深感两方面的轻重不易处理,然也只有尽力而为而已。

小说在古代属于委巷传闻、俚野琐屑之类,文体的地位根本无法与诗文相比。而对小说的评点更不被纳入谈诗说艺的“风雅”范畴,它与源远流长的诗话品评在许多文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性质相同的东西。在正统的观念下,说诗解颐已属赏析之闲雅,⁴更何况笔涉君子不齿的说部。用今天的话来说,它不是正经的文学评论。诸家的说部评点虽然独步几乎三百年,却知音难觅。历史上,没有多少士大夫把评点看作正经的东西,它们是免不了被归入下里巴人一类。今天,已经没有人把诸如“四大奇书”这样的作品视作说书弹词一类的纯粹通俗读物,相反它们已经被当作代表中国文化精粹的经典之作。⁵同样我们也应当把小说评点看作严肃的论文谈艺之作,在古典文学理论的王国里,小说评点是重要的一翼,哪怕它们的历史和份量都不如诗论文论。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学远非无聊琐屑的文字,它反映了那些谙熟经典、资深练达的文人学士的价值观念与美学理念。创造这些批评文字的评点家,与创造晚明多姿多彩的文人文化的诸位大家是同一批人,他们不比同时代其他领域的文人学士逊色。他们留下的小说批评文本与同时代有关文化方面的其他经典著作一样都是那个时代的有力见证,也是我们当代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今天探讨评点学就应当将自己从评点不入批评正流的观念中解放出来。笔者相信只有穿透历史的迷雾,还评点学的本来面目,才能谈得上清理这笔丰富的文论遗产和发掘它们的现代意义。

注 释

“四大奇书”的写定年代,除《金瓶梅》、《西游记》较易确定外,至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学界多有不同意见。如以“写定本”作标准,我认为浦安迪的“16世纪”说是有相当道理的。故本文从浦说。见《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沈亨寿译,第一页。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浦氏的原文是:“four of the most beloved work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came into circulation in their most fully developed forms.” Andrew H. Plaks: 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ew Jersey, 1987. P3.

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李开先《一笑散》都提到过《水浒传》故事,李开先还特别提到该

书有二十册,刚好符合所知繁本长度。

“四大奇书”一说,最早见李渔为毛氏父子评点《三国志演义》作的序文。文曰:“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其赏称为近是。”序文作于康熙十八年(1679)。见《李渔全集》第十卷,第1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六编《元代文学》之第七章,简单陈述了他们所据的理由,认为把这两部作品“编入元代文学比较合理”。见该书下卷,第17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浦安迪整部书的分析都在证明他“16世纪文人小说”的论点。在他看来,根据目前的资料,从作者生平年代决定作品成书年代的思路是毫无意义的。只能断定何时是版本演化史上最重要的时间。见序文,同注。

参阅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沈亨寿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浦安迪后来在《中国叙事学》一书中加强了他早先的论点,似有否认“奇书文体”与弹词、平话等通俗文体的联系的倾向,而认为“奇书文体”远宗史传文与神话。我相当认同“文人小说”(literati novel)的看法,但文人之作与通俗文体存在某种联系并非不自然。浦氏后来的看法似有过当之处。见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极辩容本为李卓吾评点。而王先霭、周伟民《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持论几乎与陈洪相反。他们认为,容本评点不会是李贽所作,而袁本评点较接近李贽的思想,至少是参照了李贽原批加工而成。章培恒新版容与堂本《水浒传》序亦断容本评点不是李贽所为。笔者亦以为容本评点非李贽所为近是。见陈洪《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王先霭、周伟民《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年。章培恒《容与堂本水浒传·序》,见《容与堂本水浒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容本优于袁本,学术界并无异议。

据肖欣桥的《点校说明》,《李笠翁批阅三国志》当成书于毛氏父子评本正式出版之后。“因为其中一部分眉批是照搬毛本夹批,有一部分眉批在毛批的基础上稍作增删或改写”。出处同注。

此处从王先霭、周伟民两氏考订之说。见两氏著《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第365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年。

- 1 元王实甫《西厢记》虽是剧本,但金圣叹并非未从剧本的角度批评。金氏纯粹把它看成天地间一部妙文,其中与虚构叙述文道理相通的地方亦可以纳入讨论范围。浦安迪在《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一书中,明言他对小说本文的释义,是取金本《水浒传》、毛氏父子本《三国演义》、张本《金瓶梅》的读解为首要解释框架。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将上述三本单列加以讨论。而王先霭、周伟民《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和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均单章论述金圣叹而并章论述毛氏父子与张竹坡。由此看来诸种评点本的优劣,学界没有分歧的意见,所存者见解深浅不同耳。
- 2 小说一词最早见《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但这里“小说”只是“琐屑之言”的意思(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后又见于桓谭《新论》和班固《汉书·艺文志》。但班固时代的“小说”亦非今天小说的意思,而是指街谈巷语、野史笔记、遗文逸趣之类。唐以后虚构故事意义的小说产生之后,“小说”一词似兼指野闻笔记和虚构故事意义两义。
- 3 “文笔之辨”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热点之一。通过辨别“文”与“笔”的差异,辨别“文”与其他体裁的不同,从而达到对文学本性和特征的新认识。参阅刘勰《文心雕龙·总术》;肖统《文选·序》,见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梁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 4 如果说诗、古文是属于立言不朽的“盛事”,品诗谈艺就是属于文人生活里的风雅谈资。古典文论批评史上第一部诗话宋欧阳修《六一诗话》开篇一句:“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他自画画像,作《六一居士传》,可推知旧时士大夫好风雅的心态:“六一居士初谪滁山,自号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颍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六一诗话》见《欧阳修全集》下册,第1035页。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六一

居士传》见该书之《居士集》第四十四卷。

- 5 庞朴、刘泽华选了三十部古典代表中国文化的精粹,《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在列。见庞朴、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

第二章 晚明背景下的文人文化

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的兴起自然离不开晚明的历史背景,而在历史背景诸要素中,尤与晚明文人文化存在极其深厚的渊源关系。它本身就是这个时期文人文化的组成部分。如要求得对评点学通透的说明,则必须对那个时期的文人文化有深切的理解。在这一章里,笔者试图提出“晚明文人文化”的概念,作为理解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的背景因素。因为评点学表现出来的社会立场、思维方式、美学趣味、人生态度,都是植根于那个时代颇有点特殊的文人文化之中的。鼓吹俚野稗官,捉笔评点小说的文人,与直接写作、整理传奇、小说的文人本质上并无什么两样,他们同样对传统文化精熟练达。更广泛一点,在文学领域捉笔弄墨表现才能的文人与当时提倡“文人画”、埋头于私家历史著述、纵迹于山川名胜、热心于外来新宗教的文人是同一批人。他们生长在相同的历史环境,面临着同样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一样地怀着抱负,希望对他们效忠的朝廷,对他们生长的社会有所贡献。只不过由于人生际遇不同,各自擅长不一,以致后来所达成的文化贡献千差万别。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把他们看作有相对一致性的文人圈子,并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理解他们在文化上的创造。

文人文化是中国历史上屡见的现象,不但诗词歌赋、园林隐逸、声容美食可以归之于文人文化,而且林下讲学、考据经典也可以看作是古代文人文化的一种形态。因为“文人”的概念今古不同。古代士大夫是社会的中坚阶级,虽同为《左传》所谓“肉食者”、孟子所谓“劳心者”,但面目可以多变。在朝为官,在乡为绅,在野为学者、为文人。与今天专门从事写作的文人是大大不相同的。大体上,作为社会的中坚阶级统称之曰士大夫,而在既不在朝做官又鲜治产业的时候,文人的那张面孔就看得更清楚些。或者说,士大夫在那样的情景下,所作所为就更象文人。当然鉴于士大夫的身份多变,历史上亦官亦学亦文人的士大夫大有人在。所以也不可在士大夫的文人与非文人之间划出截然的界限。这里讨论的晚明文人文化,一方面与历史上的文人文化有相同的一面,无论如何它是属于中国古代文人文化范畴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它又有自己独特的地方,独特的形态和特点。因为它是生长于晚明的历史背景里,独特的社会背景给晚明文人文化烙下与众不同的烙印。在晚明历史里,有三种因素是我们需要重点探讨的。这就是朝纲废弛、士林讲学之风尚和商品经济的活跃。朝纲的废弛使士大夫按儒家理想进行的经世事业遭受沉重的挫折;而求学问道褒扬气节则相当程度塑造了晚明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和人文趣味;商品经济的活跃则拓展了士大夫的人生舞台,为演剧、出版乃至讲学游历等活动提供了经济条件,甚至间接影响了他们对社会、人生的看法和期待。当我们了解晚明文人文化,进而了解小说评点学的时候,就必须细察晚明颇为独特的历史背景。

论到明代的经济,有一点必须切记:这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经济乃至政治的状况远不是处于平衡的态势,地区与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明朝与唐宋以来形成的地区差局面大致相当,长江下游的东南地区富庶而西北西南地区穷瘠。晚明商品经济和贸易的活跃同样不排除西北西南等边陲地带经济、政治的破落乃至解体这样的实事。被正史当成万历朝武功骄人成绩的所谓“万历三大征”分别发生在西北的宁夏、西南的播州和东北。除“东征”是属于“御倭援朝”之外,其余都是地方武装集团的叛乱,叛乱所掩盖的正是经济和政治的破产、破败。而最终倾覆明朝的李自成斩木揭竿崛起于西北地区,更是说明了晚明边陲广大地区民生穷困、经济崩溃的实事。所以,晚明的商品经济的活跃、豪族巨贾并不鲜见,是就帝国的东南地区而言的,即今浙江、江苏和安徽的徽州地区。晚明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活跃确实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时,贸易往来、财富集中、都市繁华并不排除乡村贫困、农民逃亡的一面。晚明商品经济的活跃,并不是一个社会在正常轨道上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准确地说,它是王朝衰落时的经济上的畸形局面。

谈到明中以后的经济,学者大都引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歙县风土论》中的一段话:

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相互凌夺,各自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纷华染矣,靡汰臻矣。

……

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猾侵牟。

商品生产和贸易的转趋活跃,在古代常常伴随着以土地为标志的财富的集中,由此而来的贫富分化也成为瞩目的社会现象。士人站在维持风教和朝廷整体利益的立场,对经济的这种变化多持痛心疾首的态度,顾炎武也不例外。“本富尽少”就是事农致富的人少了;而“末富居多”就是以商业、贸易致富的人多。歙县又称新安,明代属徽州府管辖,此外还有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五县,明代有“徽人多商贾”一说。除徽州外,当时的苏州、扬州、南京、松江、温州、通州等地,构成了帝国最为繁华富庶的经济中心区。如修于万历三年(1575)的江苏《通州志》说到明初以来风俗的变化,透出经济渐次活跃的消息:“或谓江山控于吴越,风俗邻于邹鲁,鱼盐之利,商贾多集。”承平日久,风俗替变:“今之时视平谷(疑为俗)时则又异矣。……服饰以靡丽相高,纨绔子弟,群游荡,纵酒博塞,挟妓而遨;桀黠之徒,把持有司,窝匿逆者,阴肆报复,造作飞语,中伤善类,发伏告奸,淫贞缙白,日甚一日。”通州在嘉靖年间是抗倭的战区,经济、民生均受战事的影响而凋敝。嘉靖末年战事平息,经隆庆(1567—1572)间短期休养生息,经济得到恢复。但从史志描述的经济活跃,我们可知是奢靡型消费的活跃。在一个投资机会不大,投资回报缺乏制度保障的社会,积累起来的财富大都流到纯粹的消费领域。所以,在古代政治经济制度下财富的积累必然引起消费的过度高涨。而我们则可以从关于奢靡风俗的记载中推知经济活动的频繁和活跃。从区域经济至明中叶以后的变化也可见当时商品经济的畅旺。

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必然引起相互合作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复杂化,明中叶以后出现了一些关于商贾活动的前所未有的记载。尚钺引沈思孝《晋录》:“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为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这种数人合伙行商共担风险共分所得或者雇佣劳力者进行生产、商业贸易的方式,《金瓶梅》、《三言二拍》等文学作品也有写到。在社会生活的层面,经商是致富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无怪乎野史俚闻所称富室者,无不以经商致之。谢肇淛《五杂俎》多处提到东南地区的畸形繁荣和商业与贸易的情况。谢肇淛是万历三十年(1602)进士,历任湖州推官、工部郎中、广西右布政使等职,游历既广,所说有相当可信度: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贯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然新安人衣食亦甚菲啬,薄糜盐齏,欣然一饱矣,惟娶妓,宿妓,争讼,则挥金如土。余友汪宗姬家巨万,与人争尺地,捐万金;娶一狭邪如之,鲜车怒马,不避监司捕之,立捐数万金,不十年,萧然矣。

海上操舟者,初不过取捷径,往来贸易耳;久之,渐习,遂之夷国。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旅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刺迦、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来,率以为常;所得不赀,什九起家。于是射利愚民,辐辏竞趋,以为奇货,而榷采之中使,利其往来税课,以便渔猎。

连一些世家大族也“放下臭架子”，操贾为业。唐顺之论到当时新安的民生状况：“新安土硇狭，田蓄少，人庶仰贾而食，即閭閻家不憚为贾。而程长君、少君亦间出为贾。他贾人率婪黷重钱，心计极毫厘。然占所进货，顾或反薄少君兄弟长者大度，计。尝东贾吴，北贾鲁，吴鲁人皆乐与少君兄弟游，益就之。”福建、广东的沿海地区也是商业贸易频繁之地，“在昔州全盛时，番舶衔尾而至，其大笼江，望之如蜃楼，殊蛮穷岛之珍异，浪运风督，以凑郁江之步者，岁不下十余舶，豪尚大贾，各以其土所宜，相贸易得利不赀。故曰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贪者艳之。”“又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检阅当时明人的著述，诸如此类的记载还有很多，尤其是方志和野史笔记，前者如《苏州府志》、《杭州府志》、《松江府志》，后者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篇》、谢肇淛《五杂俎》、张瀚《松窗梦语》等等。

明中叶以后商业和贸易的生气活泼和商贾巨富的出现与其说是资本主义萌芽或走向近代化性质的推进，不如说是朝政失控的结果。就帝国政制的本意是绝无企图，也无能力引导社会走向全面的商业化，或者顺此潮流推动市场经济。只不过由于承平日久，官僚怠政，贪污腐败，施政意图不能有效贯彻，致使民人中之有才能有条件者愈规乱矩，半靠辛勤，半靠巧取豪夺，而晋身巨富。经济的活跃从来就引起二重的后果，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的繁荣，灯红酒绿；另一方面则是帝国政制的低落和道德的沦丧。经济的变化与稳定的社会秩序、淳朴的民风似乎已经形成了恶性的循环：秩序松弛朝政失控才能使那些“势豪之家”、“衣冠之盗”发财致富；而财富增加并没有使各阶层分享经济的繁荣，反过来使既定的秩序受到日益严重的这种来自内部的挑战。在有明二百七十六年中，万历年间（1573—1620）是公认经济活跃社会尚算安定的年份。而历史学家探究明朝的覆亡，却认为根子出在万历。¹经济回升贸易频繁必然会与既定的政治经济秩序相冲突，例子就是嘉靖年间的平定“倭寇”事件。朝廷一直禁止民间的海运通商，律有明载，但无法实际上彻底执行。东南沿海的一些“奸豪”、“势豪”利用官府管辖的松弛，私做船只进行走私贸易，这是当时公开的秘密。因为利之所在，不同国籍的冒险家纷至沓来，以致走私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大。政府忍无可忍，终于重申海禁，派兵取缔民间的非法通商。但因走私贸易致富的“势豪”已经羽翼丰满。他们私组武装，勾结来自日本的“倭寇”，抢掠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爆发与政府军的冲突。后经胡宗宪、戚继光的镇压，开明的地方督抚奏请朝廷放宽海禁，事件在嘉靖末年渐息。²

明朝的民间经济经过开国以来长期的沉寂至嘉靖、万历间而出现蓬勃的气象，引起历史学家自五十年代起热烈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³因对明中叶以后经济的认识间接关涉到对晚明文人文化的估量，在此略陈笔者的看法。对于如何界定资本主义，学界似无定论。⁴笔者认同这样的思路：从管理社会组织的技术层面去认识资本主义，它以商业组织的普及壮大能使国家做到数目字上的管理、有一套法律和金融制度配合商业组织的运作与保障私人财产权及投资利益、提倡资金流通和人才活用、科技发明能够社会共同使用。⁵单有商人资本并不能构成资本主义的体制，正如一个嘉靖年间的商贾与一个十五世纪的威尼斯商人其社会含义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各自资本代表的社会份量存在霄壤之别。象雇佣劳动、家族经商等等例子征诸史籍，并非明中以后所仅见，早在战国两汉就已有之。孤立地看待它们，“萌芽”就不仅是明代而是远在纪元之前。但这样认识历史现象并无建设性的意义。论家所列举的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无非是史籍记载中富甲一方巨贾豪族的出现、往来通商的频繁、平定“倭寇”事件与万历年间“矿税”纠纷。其中可以存疑的地方是将某种资本主义具有的特征孤立地评价它们在十六、十七世纪中国社会的含义，一如将“杨朱为我”看成是个人主义的“萌芽”。至于有的论家以“矿税”纠纷企图证成市民阶级的出现，已有详细的史料

辨证予与澄清。⁶当然也有部分问题出在“萌芽”这个词含义不清上,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可能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以嘉靖、万历间中国社会与所谓资本主义相较,问题恐怕不是存在于“萌芽”与“长大”的程度差别,而是机制之间的相互配合。不错,江南与东南沿海地区是存在相当频繁的通商贸易,亦有因通商而致富的富家大户。但它不是有其他机制相互配合的资本主义架构中的一个部分,而是游离出当时社会组织的异常病态现象,一如癌症,它的出现预兆着全面崩溃日益临近。就象黎澍说到繁荣的社会意义那样:“官吏和富豪的奢侈的生活扩大了商品的需要,而农民则被迫着用更多的劳动来进行生产或甚至把自己的必需品拿出来供给这种需要,以抵偿债务或应付官吏和富豪的勒索。这是明朝中叶以后商业日趋繁荣的根本原因。”⁷嘉靖、万历间的经济活跃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那种经济活跃,它在中国历史情景中单有其意义,需要辨别清楚。在当时商业和贸易的畅旺造成了消费的高涨,启导了风俗的奢靡。士大夫谈到此无不痛心疾首,良有以也。

基于上述对明中叶以后经济变化的认识,在估量它对文人文化的影响时,实不宜由此而推导出文人文化是带有近代启蒙性质的文化,亦不宜注重它对士大夫心灵的冲击,以为这是商品化的潮流改变了他们的儒家信念;经济活跃风俗奢侈只是提高了文化消费的需求,造就了演艺、出版的市场,无形中扩大了文人生存的空间,给了一个让他们发挥文学艺术才华的天地,笔者以为循着这样的思路来评估经济对文人文化的影响是更为贴切的。一个生活在唐宋年代而仕途失意的士大夫,他可能归隐山林,可能品茶吟诗,也可能埋头野史笔记或儒家经典,但绝不可能搬弄传奇演艺,绝不可能编撰正人君子不齿的俚野稗官,正如生活在乾嘉年代无意仕进的士大夫大都只能潜心考据一样。这就是经济变化和风尚对士人生活的影响。

晚明历史背景的另一面是朝纲的废弛,它令士大夫的抱负遭受沉重的打击。明朝正德(1506—1521)开始朝纲日坏,朝政日非。继统的人君除嘉靖早年有起衰振弊之治外,其余不是任性妄为就是荒怠不理朝政。明祚虽衰而不亡,端赖士大夫秉持气节一意维持。正德继位的时候,离史书最为称道的守文太平的“仁、宣之治”(1425—1435)过去已经七十年,⁸所谓纳谏、所谓谨守君道在这位一生爱好逸乐冶游击球走马的皇帝已成为遥远的记忆。他有天下十六年,就是四处游走、声色犬马的十六年。例如,史书记载:“帝惑于群奄,二年八月,于西华门外别构院,筑宫殿,而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栊列,谓之豹房。初帝令内侍仿设麇肆,身衣估人衣,与贸易,持簿算喧询不相下,更令作市正调和之,拥至廊下家,廊下家者,中官于永巷所张酒肆也,坐当垆妇其中,帝至,杂出牵衣,蜂簇而入,醉即宿其处。”⁹“豹房”豢养各处进贡的猛兽,各处收罗来的美女,正德终日以搏击猛兽醉酒作乐为业,政事委之于太监刘谨,后谨诛,与边将江彬微服出京游宣府,建“军门”,中外大小事均通过江彬入奏,自称“威武大将军朱寿”。群臣屡谏不听,皇太后死乃发丧还京。正德十四年,群臣接连上疏规谏,先是兵部郎中黄巩,继以修撰舒芬等七人,又继以吏部员外郎夏良胜、礼部主事万潮、太常博士陈九川复连入疏,吏部郎中张衍庆等十四人继之,刑部郎中陆俸等五十三人又继之,礼部郎中姜龙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孙凤等十六人又继之,连医士徐鏊也上疏规谏。满朝士大夫大有前赴后继万死不辞之势。但正德将黄巩等七人下狱,舒芬等一百零七人罚跪午门外五日。后又有士大夫上疏,得到的结果不是系狱,就是罚跪、戍边。¹⁰正德十六年死于“豹房”。“武宗之昏狂无道,方古齐东昏、隋炀帝之流,并无逊色。”¹¹正德的失道对士大夫的士气投下了阴影,儒家的道德勇气依然存在,但对现实政治的信心则明显不足。

接下来在位时间长的嘉靖(1522—1566)、万历(1573—1620)前者统治了四十五年,后者在位四十八年,他们继承了正德任性妄为刚愎自用的“遗风”。嘉靖初年颇有一番作为,革除了武宗遗留的弊政,如减租税、毁豹房、诛奸臣之类。但由于武宗荒淫无嗣,嘉靖以宪宗子兴献王之子迎立继统,

与武宗同辈,继统与继嗣不一。在追崇生父兴献王称号的时候,引起“议礼”的争执。嘉靖利用廷臣的分裂,在长达近二十年的断续“议礼”中,一步一步将自己的意志付诸实现。²而当初反对不继嗣而势力强大的廷臣,在嘉靖的分化下逐渐瓦解。但嘉靖本人也在长期的较量中精疲力尽,更因嘉靖二十一年(1542)宫女谋杀他的“壬寅宫变”而意志消沉,³转信方士而事斋醮。纵观嘉靖朝“议礼”,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较量。史家对“议礼”的评价是“嘉靖一朝,始终以祀事为害政之枢纽,崇奉所生,已极憎爱之私,启人报复奔竞之渐矣。”⁴此实为允当的结论。只要我们翻阅《明史》看看与嘉靖意见相左的元老重臣和一般廷臣的下场,就可以知道这场害政之争对士大夫的震撼。定策迎立的首辅杨廷和最终的下场是“削职为民”,继杨廷和的首辅梁储上疏求去而罢官,后继首辅蒋冕罢官,又后继首辅毛纪上疏乞骸骨致仕。⁵“议礼”之争最悲壮的一幕出现在嘉靖三年七月,因嘉靖封生父、生母为皇帝、皇太后问题,引发朝廷九卿、詹事、翰林、给事、御史、六部、大理几乎等所有政府部门共二百二十九位官员跪伏文华门,“自辰至午”而不起。杨廷和之子修撰杨慎曰:“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群臣撼门大哭,“声震阙廷”。嘉靖勃然大怒,先系为首者八人下诏狱,后系一百九十人于狱。越数日,为首者戍边,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杖,有十七人被杖死。⁶经此一难,衣冠丧气。朝廷士大夫开始分裂,后来朋党门派之争即肇始于“议礼”。

万历以十岁幼冲之龄继位,除张居正治下的十年新政有成就外,其余时候荒怠乱政,远甚于嘉靖。万历因立储问题与廷臣意见不一,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对峙。另一方面,嘉靖以来养成的朋党攻讦风气因张居正死而愈演愈甚。⁷史家论到万历朝政时说,“万历间言官封奏,抗直之声满天下。实则不达御前,矫激以取名者,于执政列卿诋毁无所不至,而并不得祸,徒腾布于听闻之间,使被论者愧愤求去,而无真是非可言,此醉梦之局所由成也。申时行当国,承张居正后,逆揣帝意,为此以济其荒怠,养成只有朋党而无政府之状,政事军事,一切不可为,其端实启于此,庸主济以庸臣,所以合而酿亡国之祸也。”⁸史书记载,万历十六年秋是万历一生最后一次离开宫禁,前往天寿山视察他死后的居所寿宫。⁹从万历十四年起,就很少视朝,以病为由罢经筵。万历十八年最后一次视朝,¹⁰此后三十年,从未视朝问政。间或通过批阅奏章处理边务,堂堂朝廷几乎成了空阙。大学士吴道南自从登第以来未见过皇上是何样貌,四十二年,万历病重以为自己不久人世,遂召见元老重臣,辅臣久不上朝已不习人臣见君的礼仪,史载吴道南“举动失所,狂怖失措”。¹¹万历对廷臣采取消极对抗的策略,既不视朝,不举行经筵,不亲郊庙,不批答奏章,连中外缺官也不补,更离奇的是官员上疏求去也不批。万历末年官职遗缺十分严重:“旧制,给事中五十余员,御史百余员。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十三道止五人,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按率不得代。六部堂上官仅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文武大选、急选官及四方教职,积数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画凭,久滞都下,时攀执政舆哀诉。诏狱囚,以理刑无人不决遣,家属聚号长安门。职业尽弛,上下解体。”¹²面对这种朝政废弛的状况,官员尽管不乏儒家教养出来的勇气,但他们协君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终归于失败,他们的仕宦生涯亦多半途而废。万历一朝的首辅,张居正除外,申时行因建储和太子出阁读书事两面不讨好,十九年五十七岁时心灰意懒,上疏乞休,万历亦不留,死年八十,时万历四十二年。王锡爵十二年已拜大学士,十八年乞归省,二十一年复招为首辅,次年终于说通万历,太子出阁礼成,他亦八疏力辞,时年六十一岁。后沈一贯做首辅时,不为众论所容,竟至谢病不出门,万历三十四年罢官。黄仁宇恰当地总结了万历朝这一部失败的纪录:“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身败而兼名裂。”¹³

朝政废弛对晚明文人文化的影响可以分开两个方面来理解：它影响了士大夫的人生道路；它塑造了文人文化的某些品格。第一方面关乎士大夫的生存状况和内心动机，下文才详细论述，在此姑略申一二。士大夫浸淫儒家学说，无不以追求读书出身在社会上建功立业为自己人生的目标，况且古代社会并无职业化问题，士农工商本来选择的可能就不大，社会和价值观同时造就了他们对前途出路的选择。因此仕宦理所当然就是唯一立身做人的目标，至于日后弄起词曲小说、或者以著述、评点自娱，无不是退而求其次的不得不然。明中以后的政治荒怠任性无常在士大夫的人生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看看那些对晚明文人文化有贡献的士大夫，他们的仕宦经历无不留下可悲的失败记录。只是在仕宦无门伤痕累累的情况下，才转以文化上的发挥充填自己的人生。而且晚明文人文化的创造者，有姓名可考者几乎都是当时才智一流的人物。如果政治清明一点，我相信他们没有必要玩笔弄墨。因为就在他们以文化为发挥才能的途径时，他们内心的自我评价还远没有仕宦高。可以说，没有荒怠废弛的晚明政治，它的衍生物——晚明文人文化——很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造物是公正的，这些士大夫在仕宦上是失败了，但他们在文化上的贡献却流传千古。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晚明士大夫的心灵里，理想与现实的分裂比之明代历史其他时期为大。造成这种分裂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所有作为和无所作为必然通向失败的这种局面。士大夫一方面仍有昂扬的儒家信念，另一方面又在现实中面对重重挫折。这种心态自然投射到他们的思想和作品中来，造成一方面思想和文风的“狂放”品格，对世俗的讥讽斥责不遗余力，极尽尖酸刻薄的能事，大有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味道；另一方面又不失为儒家之徒，在思想框架上并未越出圣人的教诲，这些文人属于中国历史上那些“正统的异端”。这样的性格同样见之于该时期的文学作品。士大夫写作的传奇、小说用尽影射、反讽和隐晦的手法，嘲弄各式虚伪的“圣人之徒”，字里行间连皇上都敢挖苦一通，严肃的说教之后总是伴随一些下流的玩笑和露骨的情欲，但事后却声明只有儒家的古训才能改变这种局面。当我们追溯晚明作品修辞的复杂性和独创性的时候，不可以忘记时代烙印的作用。

明代士林讲学的风气极盛，这对士大夫内心世界里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裂痕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方面是所有作为必然通向失败的现实局面，另一方面是圣人教诲所唤起理想热情，这两方面的情形不能在明中以后的社会得到安顿，这对士大夫的内心世界和为人处世的行为方式都有深远的影响。明代元兴，革除元人鄙视中原文化的陋习，儒家之学的复兴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明初太祖好儒术，建文时方孝儒被称为“天下读书种子”。³由宣宗时曹端开始，后有薛宣，世尊称之为“薛夫子”，卒后从祀文庙，是有明从祀文庙的四人之一。³他以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为士大夫树立标准，影响公卿士庶道德是非。成化、弘治间又有陈献章出，世称“陈白沙先生”，为王学先导。士林讲学之风，由此大炽。孟森有一段话论到讲学盛况及其对士大夫人格心灵的塑造：

则门弟子等盛，学说等行，出大儒之门者，终身服膺师说，服官皆有名节，不负所学。亦多有已通籍而解官受业于门者，《儒林传》中不少其人，一时学风，可见人知向道，求为正人君子者多，而英挺不欲自卑之士大夫，即不必尽及诸儒之门，亦皆思以名节自见。故奄宦贵戚，混浊于朝，趋附者固自有人；论劾蒙祸，濒死而不悔者，在当时实极盛，即被祸至死，时论以为荣，不似后来清代士大夫，以帝王之是非为是非，帝以为罪人，无人敢道其非罪。故清议二字，独存明代，读全史当细寻之，而其根源即由学风所养成也。⁶

孟森在这里谈的是时代学风与士大夫的节气操守的关系，士林讲学对明代士风的正面影响是不能否认的。明士大夫的名节在二千年的帝制历史中，似可比东汉而在历代之上。如嘉靖时的海瑞、万历时的邹元标、雒于仁，明知会死难临头但格于职责道义，毅然上疏直指当朝权贵或皇帝，他们万死不辞的壮举倾动了当时的朝野。